

我國文字的演進及其傾向

• 李劍南 •

有人說火的發明，是人類最大的一個進步；因為牠不僅給了人光明，並且可以使人用牠駕馭自然界的一切；然而牠的偉大還趕不上這能够記錄人類思想和進步的文字。

自從有了文字以後，人類就由僅能生存的狀態之中完成了文化的發展，馴致建設成今日的社會。

文字觀念的形成，並不是由少數聰明睿智之士發明的，是漸漸的經過許多年代不知不覺的萌芽在人類的意識裡。經過若干年的實地應用，增加，淘汰和演進，雖然演進得是那樣的遲緩。

文字的演進，最早是圖畫時期，其次是標意時期，最後是標音時期。這是一切文字演進的公例，當然我國的文字也不例外。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答楚子問：「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料想那就是我國最早的圖畫字。再看日寅父癸彝的「日」字作「𠄎」；虎爵的「虎」字作「𧇧」；這不是圖畫是甚麼？所以許慎說文解字序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又說：「文者，物象之本。」又說：「書者，如也。」文的本訓是「畫畫」，就指的是上古時代的圖畫文字。這種文字本是描繪物象，以為呼此物象的聲音的記號的。這時候，各造各的文字，同一物象可以畫出許多的花樣，所以古文的異形很多。這時候的文字，就是圖畫時期的文字，也就是以後「六書」所說的「象形」字。

但是有形可象的，才可以造象形字，沒有形可象的，就又想了一種法子來：譬如「上」字作「上」，「下」字作「下」，「立」字作「立」，上、下、立這些字、都是沒有形可以象的，於是假定一畫做個標準；在一畫上面放一豎（丨），就是上字；在一畫下面放一豎（丨），就是下字；至於立字這一畫，又把牠當做地的記號，上面寫個「人」字，（人是古文大字，大字本來的意義就是人字。）彷彿是人立在地上的樣子：這樣叫做「指事」字，意思是說指着這事情的樣子，看了這個假定的形象，就可以知道這個字的意義。

後來還有「會意」字，是把幾個字合成一個字，這幾個字的意義，就是這合成的一個字的意義。譬如「天」字從一大兩個字，就是說「天」是一樣大的東西，沒有第二樣東西能跟牠相比的。「初」字的意義，是起頭裁衣服，所以從刀衣兩個字，就是說拿把刀去裁衣服的意思。「休」字的意義，是說人休息，所以從人木兩個字，就是說人在樹底下休息的意思。這「指事」，「會意」兩種字，雖然也都是從形像意義上造出來的，但是牠却以表意為主，所以這個時期的文字已進入了「標意時期」。

但是社會上的事是一天比一天多的，形象意義是有不够用的時候，於是又造出「形聲」字來。甚麼叫做形聲字呢？就是一邊寫這個字的形象，一邊寫這個字的聲音。譬如「蘇」字，本義是紫蘇，是草類的東西，所以從艸，是個形；聲音跟蘇字一樣，所以從蘇，是個聲。「喉」字本義是喉嚨，喉嚨在嘴裡邊，所以從口，是個形；聲音跟候字一樣，所以從候，是個聲。「餅」字本義是粉做的餅，可以吃的，所以從食，是個形；聲音跟耳字一樣，所以從耳，是個聲。自從這形聲字一造，一切的東西，都可以有名目了。這是因為無論甚麼事物，總有個意義，所以總可以有個字去配他做「形」。一切事物的「名」，都是先用聲音說出，才造文字寫出，所以這字的聲音叫甚麼，就可以把一個同音先造的字去配他做「聲」。再加上「轉注」，「假借」兩種方法，無論甚麼新造的東西，新發明的道理，都可以用他字的意義引申，借他的聲音做樣記寫出來。同時也把我國的文字推進到「標音時期」。

我們再從文字形體方面來看一看演進的情形。

上古時候的圖畫文字，寫法沒有一定。到了周朝初年，教育大興，小孩子八歲就要進小學校。頭一步就是識字，所以周朝的時候，有學問的人很多。後來周宣王的時候，有一個人，叫做史籀，他又造了一種字，叫做「大篆」，又叫「籀文」。他把他造的這一種大篆，做成一部書，名叫「史篇」。這部書早已沒有了，但是他造的字，在說文解字裡選收了許多。大概是史籀看到當時文字的寫法太不統一，無法普及，他就聚合各種異體，寫成一個一定的形體。說起來，史籀在中國文字上很有一番整齊統一的功勞的。等到秦始皇滅了六國。秦丞相李斯拿秦國的文字做標準，造了一套字。這種字就叫做「小篆」。（所以叫小篆的緣故，因為小篆的筆畫就是拿史籀的大篆來改少一點，其實就是大篆的省高。）李斯就做了一部書叫做「倉頡篇」。

李斯用小篆統一文字，正是秦朝正在厲行專制的時候。公文的应用一天比一天多。因為小篆的筆畫還嫌太多，書寫不便，這時候有一個叫程邈的造出一種「隸書」來。那是把小篆的筆隨意增減。此例一開，就把過去依六書造字的精意完全破壞了。於是形也不象，事也不知所指，意也會不成，形聲字不是形錯，就是聲錯了。從這點看來，程邈豈不成了中國文字的罪人？雖然他造字的動機是為了解隸們節省時間，却沒想到漢朝却拿牠派了正經的用場。如果那時候他不做隸書，漢朝當然沒有用的，恐怕也不會有我們今天所用的「楷書」。

關於文字演進的情形已經敘述過了，我們再來

談一談中國文字演進的傾向。許多研究文字的人總以為中國字是由形體而推衍孳乳的，應屬於「衍形」系；不是由聲音而推衍孳乳的，所以不屬於「衍聲」系。這種說法筆者以為值得商榷。梁任公對這個問題有如下的見解：

「惟有一事首當明辨者：流俗之論，每謂中國文字屬於衍形系統，而與印歐衍聲之系統劃然殊途，此實謬見也。倘文字而衍聲，則所謂「孳乳繁多」者末由成立，而文字之用，或息幾乎矣。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是曰六書，自班孟堅許叔重以來，皆稱為造字之本。象形、指事、會意，衍形之屬也；形聲、轉注、假借，衍聲之屬也。說文萬五百六十字，形聲之字八千四百零七，象形、指事、會意之字合計僅一千有奇，其間兼諧聲者尚三之一，依聲假借而蛻變其本意者三之一，然則中國之字，雖謂什之九屬於聲系焉可也。單字且然，其積字以成詞者更無論矣。」

梁任公先生的這種見解，我們是同意的。他說明了我國的文字演進的傾向，是由標意趨向於標音。換一句話說，也就是從「衍形」趨向於「衍聲」。請申其說於下：

以中國字為「衍形」的由來，想來是用象形字跟拼音文字比較的結果。可是說的人却忘了：(1) 二百分之一的象形字，如何可以概括全部漢字？(2) 自隸書取小篆的地位而代之以後，象形字已無形可象了。根據王筠的文字蒙求所列，全部說文中，象形字只有二百六十四個，到清朝修康熙字典的時候，已經收了四萬八千多字，但牠並沒把當時已經有的字收齊，即如遠僧行均撰的字書龍龜手鑑裡的字就沒全收。再加上後出的化學元素度量衡名詞，現在的漢字總數必定在五萬以上。二百六十多個象形字，不恰好是五萬多字的二百分之一？再從字體方面說，姑且不談大家以前的古文，就是大家，甚至小篆，象形字也還有「形」可「象」。(為減少排版的困難，恕免舉例，請參閱前文「日」「虎」例字。)等到隸書裡，太陽成了方形，月亮成了長方，牛只剩下了一隻犄角，魚長了四條腿，這樣的字還能說他「象形」？何況另外的二百分之一百九十九連這樣的象形字都不是！

漢字的「衍聲」可以說「自古已然」，「於今」並不「為烈」。譬如說：「棗」跟「棘」，「古」跟「叶」，「忠」跟「忡」，「召」跟「叨」，「怠」跟「怡」……形體構造是相同的，因為讀音不同，意義也就不不同了。又如包、胞、袍、泡、苞、匏、抱等字，從「勹」聲的，都有「包裹」的意義：這是因為聲音相近，意義也就相似了。所以就字義說，漢字是衍聲的。

濟水古作「壽」，後來音變成「ㄅ」，就用水名的「濟」字了。莊子齊物論：「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夫」字用在句末，表示商榷；後來音變了，就改用「吧」、「罷」等字了。白居易詩：「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無字用在句末，表示詢問；後來音變了，就改用「麼」、「嗎」等字

。所以就字說，漢字也是衍聲的。

漢文中有用兩字合成複音詞，往往是雙聲（如丁東、伶俐、乒乓……）或疊韻（如徘徊、倉皇、零丁……）；而且這類的詞，可以由聲音推衍出許多樣子來。如相羊（見離騷），彷徨（見史記吳王濞傳），常羊（見漢書禮樂志），徜徉（見韓愈李愿歸盤谷序……）彷彿（見傅毅舞賦），仿佛（見揚雄甘泉賦），方弗、放弗，放蕩、佻佛、倪佛（並見甘泉賦注）……這也是漢字衍聲的例證。

古人用字，語緩則一字可以增加為數字，語急則二字可以為一字。如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繕葺葺，以待賓客」。戰國策齊策：「今吾有區區之薛，而不捐受子其民。」「繕完葺」，「捐受子」，意思都是重複的，都是「慢聲」的例。隱公元年公羊傳以「如」為「不如」，莊公十三年左傳以「敢」為「不敢」，都是以語急而去一「不」字，都是「急聲」的例。至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之於」為「諸」……，「不律」為「筆」，「僻倪」為「陣」，「旌」為「銘」……寺人勃鞞即寺人披，沈括所謂合二聲以為一字的，竟是用反切拚音了。這又是漢字衍聲的一例。

根據上面所舉例證，漢字的演進，由衍形極衍聲，不能算是空談無據吧！試再從「六書」的次序看，牠是以「象形」始，而以「假借」終，這就說明了漢字要脫離「形」的束縛，向「音」的一面邁進。即如說文給假借字下的定義說道：「本無其字，依聲託事」。這話並沒能說明假借字的全貌。「本無其字」的，固然只要隨便的假借一個字就行了；就是那「本有其字」的，也不妨隨便寫一個同聲的字；所以「飛鴻」可以寫成「蜚鴻」，「歐陽」可以寫成「歐羊」，「憔悴」可以寫成「蕉萃」，「勞髒」可以寫成「放勿」。漢字發展到假借，完全成了標音的文字了，跟「形」還有甚麼關係？

假借的方法，發生在甚麼時候呢？現在所見古的真正古字，就是殷代的甲骨文，這中間已有假借字了；如借「柶」為「柶」，借「唐」為「湯」，借「果」為「媿」，借「鳳」為「風」……那麼，假借方法的發生，至遲也應該起於殷。說漢字的「衍聲」「自古已然」總不能算是過吧？自此以後直到唐朝，假借還是盛行着。宋元來，書籍有了刻版，一印幾十幾部，大家所看的字都是一樣的某義寫某字，都依着書上寫，假借風氣也就不再流行於知識份子之間了。到了清朝滿清皇帝不僅要把讀書人的精力消磨在八股文的字技巧上更進一步還要消磨在文字的筆畫上。於是龍啓瑞編的字學舉隅作為科舉書法的圭臬。假借方法不再流行，如果再有人假借字，就要被認爲「白字」（或別字）；筆畫不依字學舉隅，就要判定爲「錯字」了。

在那科舉取士，用半部論語就可以治天下時，讀書人自不妨精研字學舉隅，皓首窮經，能取紫如拾芥就够。可是如今不同了。現在的「天下

（下轉第34頁）

朱子云「天理只是仁義禮智的總稱，仁義禮智便是天理的件數，」仁字便成了天理的中心。沒有仁一切的道徳都不能整個連貫起來；沒有仁就不能完成高尚純潔圓滿無缺的人格，和至大至剛的氣節。但是仁字離開了愛便流於空洞，缺乏身體力行的精神。今天我們在研究醫藥的青年對仁愛度量的修養，更是特別重要，病人對醫生最誠最敬的推崇，是拿「仁心仁術」或「仁愛濟世」的話來表達。如果說醫生沒有仁愛之心，便將為世人所唾棄。醫生也就違背了學醫的初心，為外物矇蔽而成了沒有良知的惡人。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就是這個道理。

第二要忍耐：忍耐的功夫，也是培養器量的重要條件，能忍耐的人，才不為一時拂逆而喪志，因一時毀譽而動心，因他人誤會而發怒。一個人的志向愈高，所担当的使命愈大，所遭的困難阻礙也愈多。困難，阻礙，對一個平凡的人常是拔劍而起，挺身而鬥，其器度表現是如何褊窄，但是對一個非常的人則認定只是一種鍛鍊。就像火一樣，草在火中變成的是灰，鐵在火中變成的是鋼。所以孟子說：「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書經說：「必有忍其乃有濟。」孔子說：「小不忍則亂大謀。」

忍耐功夫的修養對學醫業的人也非常重要，病人心理生理的反常，病人的言語無度，甚至一切的腥臭實驗治療過程，病理的變化難測，如果不能忍耐，不能更細心的診斷，所得的結果將是如何？誤人誤己，真是不可想像。所以學醫業的人對忍耐功夫更應加強修養。

第三要寬容：寬容與忍耐有相類的地方，但忍耐是着眼在時間方面的，而寬容是着眼在空間方面的，寬容是要涵蓋容納，對人材的延引，要有禮賢士的風度，對問題的處理，要有從容前席的襟懷，對他人的意見，要能畫衷接納。只有能容才能大，亦只有能大才能容，一個眼光看到天下國家的人自然不會沒有容人的雅量的。明儒高攀就說：「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正是這個道理。人無長處，也都有短處，如果用人能容其短，用其長則每個人的長處都可以發揮，蔚為一個整體的力量。如果囿於私人關係，逞一己的好惡，自立畛域劃分門戶，吹毛求疵，則賢者能者也不會發生效了，李斯諫逐客書說：「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這個道理實可與容人之理互相發明。還有方孝儒說：「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包，使才知者有以自見，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尤無遺棄之怨。」這些話對於一個有大志的人來說，是不可不注意的。我們現在講的是民主政治，以多數服從多數的政治，但一件事在做成決議之前，須要容許大家儘量發表意見，並且還要尊重每一人的意見，最後透過會議表決的方式，才可以正式成立決議。如此則每個人都必須有恢宏的心胸，成舍異從同的政治雅量。切不可以在當說時不說，對人對事當批評時不敢批評，當辯論時不辯論，又退有後言，這樣實足以阻礙民主政治的進步。

以上提出的問題，只能說是不成熟的意見，開始便說了修養功夫和內容很多，我今天提的只養心和量量的研究。作為同學的參考，挂漏一定多，以後有時間再和同學研究這個問題。

（上接32頁）

擴充到「月球」甚至「火星」了。治這樣的「天下」不是「論語」而是「火箭」。現代的讀書人所需的知識不知道要比科學時代繁雜多少倍，如果還要他們精研字學舉隅，似乎有些浪費青年的精力，也無此必要。時代已經不同了，可是有些人的看法並沒大改變。只是從中國文字的演進過程來看，把文字工具看得這樣的神聖，實在不必要；並且為了學習工具必須付出過分大的代價也是不智。在學校來說（大學國文系在外），如果把學工具的時間減輕些，放在必要的知識上去，多少也有助於「惡性補習」的「消滅」與「課業負擔」的「減輕」，不知高明以為然否。

